

佛教與中國傳統音樂

潘文彦

中國古代十分重視音樂。《樂經》被奉為六藝之一。《孝經》說：「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」音樂不單是陶冶情操，怡悅心情，教化人民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。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，什麼階級可以享受什麼樣的樂舞，都有明確的規矩。《論語》中「八佾舞於庭」，就是指音樂舞蹈不合規矩，方有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」的說法。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前，就廣泛流行宮廷音樂和民間音樂，秦漢時宮廷專設音樂官署「樂府」。

據史籍記載和考古發現，可以肯定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，不僅僅限於自西域東來，而是分別經中亞、新疆、印度支那和南洋各地，相繼進入中原和江南地區的。隨著佛教傳入，梵唄鐘磬也隨之同來。相傳魏時曹子建踱步魚山，聞天上誦梵唄而作《魚山頌》，有人說他當時神思恍惚，其實這正是他處於創作階段。不過無論怎麼說，此前他曾多次聽到過唱誦梵唄，而且印象深刻，甚至可以說他曾經陶醉於這莊嚴平和的佛曲之中，才可

能有《魚山頌》的創作。

魏晉時期宮廷樂曲中很出色的一部叫龜茲樂，內容大部分是佛曲，也是隨佛教傳入中土的。南朝梁武帝正樂，其實就是把龜茲樂漢化。說起梁武帝，這是一位篤信佛教的皇帝，他曾自稱「三寶之奴」。傳說他曾命人把道教經典和佛教經典一起放在火上烤，結果道經化為灰燼，而佛經完好無損，他以為真金不怕火燒，於是大興佛法。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四次捨身寺院，由朝廷和群臣以巨額金錢贖回，並親自登臺講經。因此，佛教在江南發展很快，唐人杜牧有詩：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。」這四百八十並非確數，據史料記載，梁朝建寺二八四六座，僧尼八二七〇〇人。無疑，江南很多佛寺亦在其中。

隋文帝楊堅本是由尼姑撫養長大，信佛不亞於梁武帝。隋代宮廷設「七部樂」和「九部樂」，其中天竺樂舞曲稱為《天曲》，《天曲》就是佛曲。隋代還出現「法曲」，是佛教法會的音樂。及至唐，雖因李唐皇朝尊

神聖的樂曲聲中讓人可以品味到平和悠遠，空靈清淨的佛的境界，充分體現佛教教義的崇高偉大和慈悲平等的精神，給人以淨化心靈的啓迪，這是何等了不起的事。

其實，從音樂本身說，它是一門聽覺藝術，是不能用文字語言來說明的。如果用語言去描述音樂，往往會流於浮泛、曖昧，至少是不切實的。正是斯賓塞說過：

「音樂是人類剎那間所經驗的最敏銳最完全的表出言語。」這裡所說的言語，當然是指樂語，雖說樂語無法切實地用文學語言來替代，但是，通過節奏、速度、旋律、拍子、音程等等音樂的軀殼，至少可以表達出其基本的內涵。如軍樂的雄壯，圓舞曲的歡快，小夜曲的抒情，哀樂的淒惻悲涼，喜樂的熱情奔放，祭歌的莊嚴，頌歌的崇高。在古代（如古希臘），音樂與宗教原是十分密切的。例如婚喪祝祭都要宗教人士到場，或在教堂（寺院）進行，所謂音樂即是宗教音樂的全部，古人（如古希臘、西藏也類此）所謂宗教，其實就是社會，其所謂神，其實是民心的象徵化，故那時的宗教音樂，實在是人類思想感情的自由表現。至於紀元後到中世紀，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儘管如此，樂語所表達出來的思想感情，不同的樂曲，應該有不同的感受。作為一生愛好音樂（史稱音樂愛好家 amateur）的托爾斯泰這樣說過：「凡是最偉大最有價值的音樂，必定廣泛地被民衆所理解。」這大概就是孔老夫子聽了之後，三月不

知肉味的韶樂一類吧！筆者並非音樂專業人士對此缺乏研究，上述見地也只是作為愛好者的淺薄的見識，但是，筆者清楚地記得：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有一位頗有點名氣的法師到上海玉佛寺向上海信衆講經，在開講之前，沒有依例的誦經禮佛儀式，卻由他帶來不少青年女出家衆輪番上臺，演唱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而莊嚴神聖的佛號卻配以揚州小調、蘇州的小寡婦哭五更和寧波的馬燈調，當時筆者目瞪口呆，似乎覺得走錯了地方。姑且不說這些民間小調的格調高下，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，是高雅還是俚俗，演唱得輕佻而滑稽，實在有失宗教的神聖和莊嚴，與弘一大師的《三寶歌》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不久之後，當時上海佛協會長眞禪大和尚，決心搶救梵樂，約請上海音樂學院林培安老師主理其事，林老師抱病工作，成績可嘉，很可惜，眞禪老和尚和林老師都已作古，但最終還是製成了梵樂音帶，從中可以聆聽到悠遠、空靈、平和、慈悲的佛陀精神，足以讓後人安慰感情，陶冶情操，修養人格。其實，音樂是對人生情懷的一種修煉，是對人生價值，人生意義，人生歸宿循序漸進的探索。在這一點上，正是與宗教契合得非常貼近的。

佛教寺院對傳統音樂的收集、保存、提高和傳播功不可沒。